

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

黄 纯 艳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发展,铜钱外流成为两宋始终存在的突出问题。时人描述外流之盛道:“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①“海舶之所运,日积一日,臣恐穷吾工力,不足以给之。”^②但海外贸易并非导致铜钱外流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铜钱是贱金属货币,单位重量大而价值小,不适合大宗贸易的直接支付手段。宋代海外贸易规模极可观,一船货物动辄值数十万贯。如绍熙年间,“大食蕃客罗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③宋制“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④据郭正忠先生研究,宋代(官秤)每两常为40克左右,每斤为640克左右^⑤。三十万缗铜钱则重960吨。《梦粱录》卷十二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中者三千料至一千料”。五千料约合三百吨。三千料则合一百八十吨。三十万缗铜钱需三四只大船,中船至少六只装载。海商一船货物所得铜钱需几只船装运,显然极不便利,可见铜钱并非当时国际贸易中理想的支付手段。更何况宋政府钱禁日甚一日。然而,文献和考古的材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宋钱曾以惊人的规模冲破宋政府用无数条禁令苦心编织的恢恢天网,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这的确是十分值得探讨和引人深思的问题。

笔者认为,宋朝铜钱外流的根本原因是宋钱在海外诸国作为通货使用,而且需求量很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宋钱在各国行用的特点并非一样。根据宋钱在各国货币体系

中的作用和地位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深受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影响的高丽、日本和交趾,与宋一样以铜钱为本位货币,流入的宋钱在这三国均作主币行用。二是深受阿拉伯、印度经济文化影响的东南亚(除交趾外)^⑥及印度南部沿海和阿拉伯地区实行金银本位币制,宋钱虽大量涌入,但主要担当辅币职能。下面就宋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情况作一初步探讨。

一、宋钱在高丽、日本和交趾的行用

1. 宋钱在高丽的行用。

高丽自行铸钱的时间比较晚,据有关史籍所言,北宋崇宁以前,其国“地产铜,不知铸钱,中国所予钱,藏之府库,时出传玩而已。”原因是这一时期该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尚不高,市场交换仍是“方午为市,不用钱,第以布米贸易。”^⑦由于生产发展的长期积累,这一时期也是它逐步摆脱以物易物的交换模式,向货币经济过渡的阶段。十一、十二世纪是高丽经济的上升时期,出现了“富庶之治于斯为盛”^⑧的繁荣局面。市场虽未最后告别物物交换,但交换经济之风已盛,“上下以贾贩利入为事”^⑨,已经在招唤货币的出现,对货币的需求不再是仅供“传玩而已”,而是需要它发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换职能。由于这种原因,崇宁以后高丽“始学鼓铸”,曾发行“海东通宝”、“重宝”、“三韩通宝”三种钱^⑩。正如其统治者所说:“文物法度,则舍中国何

以哉？其钱制也依“西北二朝（指宋、辽）行之已久”^⑪之制，铸圆形方孔钱，铸文形式也与中国钱同。在钱行之初国内仍感“俗不便也”^⑫，货币经济还令人陌生，但一旦起步，它便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日增月长，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也必将不断扩大。由于高丽初学鼓铸，所造的钱币不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显然不能满足本国的货币需求，因而质量精优、信誉稳定的宋钱便像水泄于低畦，通过各种途径流向高丽，在那里充当主币与高丽钱并行。宋政府针对铜钱流向高丽，曾多次发出禁令。乾道七年知明州赵伯圭说：“（铜钱）缘海界南自闽广通化外诸国，东接高丽、日本，北接山东，一入大洋，实难拘检。”^⑬绍熙五年宁宗下诏：“禁高丽、日本商人博易铜钱。”^⑭庆元间又“诏禁商人博易铜钱入高句丽。”^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丽对宋钱需求的递增。

2. 宋钱在日本的行用^⑯

日本在八世纪初就已开始铸钱，唐代日本共发行过十二种钱币。其钱制也与中国相同。雍熙元年日僧裔然来宋时说，日本“交易用铜钱，文曰‘乾文大宝’。”^⑰日本铸造的钱币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铸币大小轻重不一，且铸造技术粗糙，同一种铸币大小轻重也不尽一致，造成币制紊乱，信用低下，因而到花山和一条天皇时日本自铸铜钱终于完全停止流通。当然，这与宋钱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允许宋钱输入之初，是想用这种与本国法定价格无关的外来铜钱带动日本法定铜钱以自然价格流通起来。宋钱的确大量涌入了，但它并未按日本统治者所望，带动日钱流通，而是喧宾夺主，扮演了流通中的主角。人们都追求形制标准，信用良好，购买力强的宋钱，而拒绝使用日钱。宋钱在日本存在广泛需求，商人贩钱也有厚利可图。包恢说：“倭所酷好者铜钱”，日商来华千方百计套购宋钱，因日商的收购，曾使“台城一日之间忽

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⑱日本统治者看到本国铜钱在汹涌而入的宋钱的排挤下不断退缩，又于后鸟羽天皇建久四年（1194）敕令禁止使用宋钱，然而经济的发展往往要为自己开路，并不被一条主观的禁令所羁绊。正如桑原鹭藏所说：建久四年令“无实际效力，通镰仓、足利时代日本通货以宋明铜钱为主。”^⑲藤家礼之助也说：“我国（指日本）社会还是卷进了汪洋的宋钱经济的旋涡中”，“可信赖的宋钱作为有效的通货来使用，最后发展到成为必不可缺的通货加以重用。”^⑳日本当时仍以铜钱为本位货币，宋钱流入后也扮演了本位货币即主币的角色。

3. 宋钱在交趾的行用。

交趾的货币制度也效法中国。据刘森研究，越南从丁朝铸造第一种钱“太平兴宝”，在两宋三百多年间，先后铸造过“太平兴宝”、“天福镇宝”、“明道元宝”等八种铜钱，其外形、铸文、工艺均与中国钱相同^㉑。黎朝交趾设有官府铸钱工场，李朝为增加铸钱曾大力发展铜矿业^㉒。陈朝时，货币经济已很活跃，并渗入农村。政府的人头税、桑田税、盐田税等开始用现钱缴纳，规定有“田一亩二亩出钱一贯，三亩四亩出钱二贯，五亩以上出钱三贯。”^㉓然而，交趾钱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存在严重不足。宋政府曾明令禁止交趾钱入境，认为商人“赍黎字及砂错钱至州”，“颇紊中国之法”^㉔。宋政府这样做，除所谓的华夷之别外，主要原因是怕这些质量粗劣、信用很差的钱币，扰乱宋朝的货币市场。事实上交趾商人到钦州等地，在用铜钱贸易的同时也大量套购宋钱。他们与宋商“贸易金香必以小平钱为约。”交趾下令：“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㉕。小平钱是宋朝所行用诸钱中最有信用的一种。史载：“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当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小平钱“行之久而无弊，多而不壅，为利博矣。”^㉖可见交趾对优质铜钱的急需。宋政

府感到“若不申严禁止,其害甚大”。并颁布铜钱漏往交趾的惩罚令^[27]。然而,禁令依然形同虚设。宋钱仍大量传入交趾,并在其国中广泛行用,以致当时的人也以为交趾自不铸钱而仅用宋钱。范成大曾任职于广西静江府,他在记其官游见闻的《桂海虞衡志》中说,交趾“不能鼓铸泉货,纯用中国小铜钱,皆商旅泄而出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沿袭此说。他们皆被宋钱在交趾行用的盛况所迷惑,而忽视了交趾铸钱事。这正说明宋钱在交趾的影响超过了交趾本国钱。

高丽、日本、交趾由于受中国制度文化的影响,都以铜钱为本位货币,且其铸钱的形式、工艺、铸文均与中国相同,皆为圆形方孔钱,皆以“××大宝”、“××通宝”、“××重宝”等为名。然而由于手工业发展水平所限,本国钱在质量数量上都存在严重不足,人们都厌弃本国而追求质优价稳的宋钱,这就是宋钱流向这些国家的根本原因。宋钱流入以上三国后均充当本位货币,甚至喧宾夺主,占据流通中的主导地位。三国都是宋钱外流巨大而稳定的市场。

二、宋钱在东南亚地区的行用

东南亚也是宋钱外流的重要地区,但这些国家实行金银本位货币制度,宋钱在这里充当辅币,主要在各国内市场上行用。

1. 金银货币在东南亚的行用。

《诸蕃志》卷上载,三佛齐“无缙钱,止凿白金贸易”。《宋史·三佛齐传》说其“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宋史·阇婆传》载,阇婆“剪银叶为钱博易”。苏吉丹以金银为通货,买卖人口用金计价,每人换金二三两^[28]。投和国“贸易皆用银钱,小如榆荚”^[29]。占城也“用金银较量锱铢”^[30]。丹流眉也是“贸易以金银”^[31]。凌牙斯在交换时要“各先以此等物准金银,然后打博”^[32]。从金银在使用中的计量单位来看,仍然是作为称量货币使用。阇婆

和苏吉丹曾发行过小额铸币,但主要用于“民间贸易”,即国内日常交换,而国际贸易或国内大交易仍使用金银。如苏吉丹出口胡椒和买卖人口都是以金银为交换手段,据史书记载,苏吉丹出口胡椒:“货银二十五两可博十包至二十包,每包五十升”^[33]。此两国铸币均以黄金价折算,阇婆币“六十准金一两,三十二准金半两”。苏吉丹的铸币“六十四只准货金一两”^[34]。体现了金作为终极价值尺度的主币地位。

金银不仅作为交换手段,而且以其终极价值尺度的身份充当支付手段和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物。贡赋、薪俸、婚聘礼物等都以金银支付。阇婆“土俗婚聘无媒妁,但纳黄金于女家以取之。”渤泥国“婚聘先以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成礼”。真腊给占城的贡礼也是“岁贡金两”。单马令、日罗亭等属国例年向三佛齐贡金银。阇婆发给军将的薪俸是每年“金二十两”,士卒“岁亦给金有差”。该国的罪犯还可用金赎罪^[35]。

金银作为本位货币正适应了东南亚十分繁荣的国际贸易需要。东南亚得享于盛产香料、药材、犀象等名贵宝货的优越自然资源。这些商品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海外贸易中的主要进口品,同时也备受西方世界青睐,是阿拉伯商人孜孜追求的对象。东南亚因而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丰富供给地。当时的国际贸易以中国和阿拉伯为东西最为活跃的两极。东南亚地扼东西海上交通的孔道。东西方商人既交汇于此博易东南亚土产,又途经东南亚远销本国商品,而且将东南亚物产转口到对方市场。宋代史籍中有大量关于东南亚本地商人来华贸易的记载^[36],说明他们也成了国际贸易中一支重要力量。东南亚既是东西两极的支点又是两极的辐心,这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加上丰富的物产和往来如织的商人,于是这个地方方便发展成一个十分繁荣的国际

贸易市场。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多层次构成的市场体系。与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局相适应,出现了三佛齐、阇婆,以及占城等,为国际性的三大中心市场。这些市场各自总汇一方货物,成为东南亚国际贸易市场体系中的第一级市场。此外,各国尚有“官场”港口,即该国的中心市场,它构成了东南亚国际贸易市场体系中的第二级市场。东西方商人到这些“官场”将货物批发给当地商人。国际间的直接贸易一般都在第一、二级中心市场以批发贸易方式进行。外国商品与消费者的直接结合这一环节则由当地商人分销。可以说各国国内市场即构成了东南亚国际贸易的第三级市场。

正因为东南亚国际贸易十分繁荣,且以批发贸易为主,交易规模巨大,因而作为贵金属货币的金银正适应了这一需要,成为主币。

2. 宋朝铜钱在东南亚的行用。

金银作为东南亚地区的本位货币运用于国际贸易及薪俸、贡赋、聘礼等的支付,它似乎充斥了东南亚的整个市场。东南亚繁荣的国际贸易主要依赖于天地所赐的自然资源优势 and 东西方贸易孔道的位置。其用以与外国商人贸易的香药并未进行人工种植,更谈不上规模经营。如占城国官府所需香药都是驱使百姓在农业生产间隙入山采集,政府按口征收身丁香,百姓缴纳之余可以贸易^③。从某种角度说,正因为东南亚各国可以依赖自然出产的丰富香药与东西方交换所需商品,特别是手工业品,且其香药出口纯系采集,与生产力发展无关,从而决定了繁荣的对外贸易起不到带动和促进东南亚各国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也决定了国际贸易市场与国内市场一定程度上的脱离,因而很难带动国内市场的发展。

东南亚国内市场作为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第三级市场,主要交换活动就是本地商人分销东西方货物和收购当地物产,集中后与外

商贸易。商人的收购是十分零散的,一是因为水岛相隔,居住分散;二是因为居民的采集活动毫无组织都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东南亚国内市场的日常交换也同样是细碎的,因而作为贵金属货币很难担当这种利尽锱铢的民间交换的媒介。

为适应细碎的“民间贸易”,阇婆和苏吉丹都制造过合金铸币,但这种价值远小于金银的铸币相对于卖斤买两的民间交换仍然太大。每只铸币可“博米三十升或四十升至百升”^④。普通的居民往往只需要在市场上换得斗米尺布,一枚铸币也常令他们面临分割的难题。贵金属金银难以大材小用,而用银铜合金所铸的钱币,价值仍然不小,不太实用,因此,人们便开始寻觅质稳价廉的贱金属来充当交换媒介。真腊国就曾用铅为币:“每两乌铅可博米二斛”^⑤。真里富也“博易衣食皆用碎铅”^⑥。阇婆、苏吉丹的铸币质大而笨拙,真腊的称量铅币又显粗陋,较之成色稳定、单位统一,价值细小而信誉又良好的宋钱,它们都逊色多了。据肖清先生研究,宋朝铜钱的购买力熙丰以前一般年景米每石约六七百文,熙丰时常价约每斗四五十文,南宋绍兴十年后一般在每石二千文^⑦,而阇婆、苏吉丹铸币每文博米三四十升至百升,若折中以每文博五十升计算,其价值在不同时期也分别是宋钱的六七倍、四五倍、二十倍。因而宋钱在东南亚交易细碎的国内市场上就显得更加小巧灵活。

正因为小小的铜钱能使百货通流,市场活跃,解决了东南亚国内市场因缺乏相适应的通货而导致的市场阻梗不畅的问题,才出现“海外东南诸番国无一不贪好(宋钱)”和“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⑧、蕃商“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⑨的现象,以致“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⑩,东南亚各国都将宋铜钱视为“镇国之宝”^⑪。桑原鹭藏说:“南洋一带,宋钱之散布更多,久而久之

遂成彼地之通货。”^④宋钱适应了东南亚各国国内市场的需要,弥补了东南亚货币体系的不足,作为辅币行用于各国内市场,才导致了其大量外流。

东南亚以西的印度、阿拉伯、东非海岸也有大量宋钱流入^⑤。但没有直接资料可说明宋钱在这些地区的行用。我们仅根据相关资料作一粗略的分析。当时印度南部沿海诸国也使用金银货币。南毗国以“白银为钱,镂官印记,民用以贸易”。故临国“交易用金银钱,银钱十二准金钱之一”^⑥。注犍国也“以金银为钱”^⑦。当时的沿海诸国繁盛一时,但其繁荣是国际贸易带来的。R·塔帕尔说,此时期“在沿海地区,海运贸易仍然支撑着港口城镇的繁荣”^⑧。与东南亚一样,国内生产力仍不发达。城镇的“产品一般是供当地消费,为出口而生产的货物则是独立组织的。”其国内市场也有铜币:“朱罗后期铜币在地方上的流通变得更加经常了。”但铜币数量不足,“在农村日常的物品通过物物交换而获得,钱币被保留着……用于在物物交换显得麻烦的地方。”^⑨根据印度南部沿海诸国使用铜币和铜币不足来看,输入的宋钱很可能充当了通货。

阿拉伯流通金银铸币“第纳尔”,巴格达港收税都以“第纳尔”计征,输入的宋钱如何行用有待进一步研究。东非海岸处于“僧祇帝国”时期,各城邦居民主要是富于商业传统的阿拉伯移民。他们发行铸币,层檀国“交易用钱,三分其齐,金铜相半而加银一分”^⑩。孙光圻先生认为:“鉴于十三世纪以前阿拉伯商人在东非贸易时大都以姆潘得贝壳作支付手段,因此,东非海岸发现的众多铜钱无疑是其时中国帆船在那儿直接交易的遗存。”^⑪但具体行用的情况仍有待深入探讨。因这些地

区以金银为本位,若宋钱在这些地区作为通货行用,其只能与东南亚一样作为辅币,主要流通于各国国内市场。

①④⑤《宋史》卷一八〇,《食货二》。②刘挚:《忠肃集》卷五,《乞复钱禁疏》。③《宋史》卷一八五《食货下七》。④《三至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第2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⑤本文以下言东南亚均不包括交趾,言交趾时专以国名标出。⑦⑧⑩⑬《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⑧《高丽史》卷七八,《食货一》。⑩《高丽史》卷七九,《食货二》。⑪《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九。⑫⑬《宋史》卷三七,《宁宗纪一》。⑭关于日本钱制的论述,除特别注出者外,参考了(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两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日)桑原鹭藏:《薄寿庚》(中华书局,1954年版),为行文简洁计,不一一标明出处。⑮《宋史》卷四九一,《日本传》。⑯包恢:《散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⑰⑱《蒲寿庚考》第31页。⑲《日中交流两千年》第137—138页。⑳刘森:《宋代中越两国货币文化交流史述》,《中国钱币》1992年第1期。㉑越南社科委著《越南历史》第161、17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㉒《大越史纪全书》卷五,《陈纪一》。㉓《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九,绍兴三年十月戊戌。㉕㉖㉗㉘㉙㉚㉛《诸蕃志》卷上。㉜《文献通考·四裔考九》。㉝《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㉞此段资料俱引《诸蕃志》。㉟①②详见《岭外代答》卷二,“三佛齐条”、“故临条”。㊱《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其里富。㊲《中国古代货币史》第225—2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㊳㊴《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㊶参阅(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及马文宪、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等书。㊷㊸(印度)R·塔帕尔:《印度的古代文明》第261、21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㊺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第412页,海洋出版社,1989年9月版。

(黄纯艳:厦门大学历史系 博士后
邮 编:361005)

责任编辑:天 舟